



悬梁与辑柳的孙敬

李润地

人们常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来赞扬刻苦学习的精神，这个典故中“头悬梁”的主人便是冀州人孙敬。

孙敬是什么时期的人呢？东汉。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载：“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睡眠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后为当世大儒。”

《后汉书》载：“孙敬，字文宝，好学，闭户读书，不堪其睡，乃以绳悬之屋梁，人曰闭户先生。”

《太平御览》卷六载：“孙敬好学，时欲寤寐，悬头至屋梁以自课。”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载：“孙敬，信都人”，并记述了其刻苦学习的典故。

孙敬，出生在一户殷实人家，不幸早年父亡，儿时的孙敬和母亲相依为命。在父亲遗教、母亲的鞭策下，孙敬夜以继日地苦读。年少好学的孙敬，博闻强记，而且视书如命，常年闭门谢

客，攻读诗书，与社会接触不多，偶尔到街市购买日用品，邻里们都称他为“闭户先生”。孙敬读书时，常常通宵达旦。为防止打瞌睡，他将自己的头发（古代男子留长发），用绳子捆住吊在房梁上，一打盹便把自己拖醒了，便接着学习。

为了参加远在京师（国都）洛阳的考试，孙敬携母亲步行千里到洛阳住下读书。那时还没有纸，而帛金贵，不是一般人家用得起的。孙敬便到河边旁搜寻柳枝，回家劈开晾干做成条子，在上边写字抄写典章。

对这位“辑柳”苦读的后生，人们不由得肃然起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有的故意多给他些粮米，有的无偿馈赠他些生活用品，还有的帮他砍柳枝劈条子。孙敬常为民众义务写算，作为回报。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日积月累，孙敬的学问修养之美名便在京师传开，

有的慕名登门求教，有的把孩童送来拜他为师。孙敬便一边进修学问，一边设帐教学。孙敬的学生最多时达数百人，他便分期分批地走教，因而名声鹊起。

孙敬凭借其“悬梁”“辑柳”的苦读精神，年复一年地学习，终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成为一代大儒。在当时江淮以北颇有名气，常有不远千里的学子，负笈担书前来向他求学解疑、讨论学问。

后人孙敬的“头悬梁”苦读精神加以褒扬，并和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的故事相加为“悬梁刺股”，成为典故。苏秦刺股苦读，成为战国时期穿梭于列国的纵横家（中国最早的外交家）。后人还对孙敬的“辑柳”学习，与西汉人路温舒的编蒲相结合组成了成语“编蒲辑柳”。西汉人路温舒，家贫，自幼牧羊，经常取山泽中的一种宽片蒲草做纸抄书。

孙敬悬梁、孙敬辑柳、孙敬闭户的故事都是反映在他勤学苦读的精神之上的。正因为如此，孙敬成为励志自勉、勤学苦读的典范。清康熙时期扬州诗局刻本《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一录李瀚的《蒙求》载：“仲连蹈海，范蠡泛湖。文宝辑（辑）柳，温舒截蒲。”其中，把孙敬辑柳的典故并称为“杜康造酒、苍颉制字、孔明卧龙、吕望非熊、孟轲养素、扬雄草玄、向秀闻笛、伯牙绝弦”之列。不仅如此，最具普及性的推广当属《三字经》中所载的“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为苦读的楷模。此外，在冀州民间，孙敬苦读的故事家喻户晓，还形成了一句歇后语：孙敬苦读——悬念。

孙敬给后世留下了两个成语典故，这是我们衡水的骄傲！

高原牧区课后服务助“双减”



近日，称多县文乐中心寄宿足球社团的学生在守门。

称多县文乐中心寄宿校坐落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校推出了课后服务，开展体育、音乐、美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高原牧区孩子们的课外生活，让孩子们快乐成长、全面发展。

新华社记者 央秀达珍 摄

实践是创作的沃土

——读傅宪荣所著几部书有感

马誉伟

不久前，收到曾在故乡景县公安局任过局长的老友傅宪荣寄来的五部书：《抗战英烈张俊峰》《我的伯父傅训庭》《最后一杯咖啡》《创业之路》《常庄史略》，都是他近十多年来呕心沥血之作。一一读罢，感慨颇多。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生活和工作经历是文学创造的沃土，用好身边资源，不要让到手的素材从手边溜走。

说傅宪荣是老友，可谓名副其实。早在我参军前在县文化馆学习时，就和傅宪荣老兄熟识了，早年他曾是我大哥在县办工厂的工友，给我的印象是待人诚恳、成熟老练。我入伍后，一直在关注他的“踪迹”：由县办工厂到基层乡政府工作，长期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先后任景县、武邑县公安局局长，在衡水市公安局机关工作至退休。一般来说，这些行当公务繁忙，似乎与文学创作隔得较远。但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一旦爱上文学，也有着一般专业作家难以企及的优势。手头得天独厚的素材资源，足以能够成为作家雄厚的创作基础。如《林海雪原》《亮剑》等名著的作者都不是专业作家。傅宪荣的创作经历，又为此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抗战英烈张俊峰》一书的主人公张俊峰烈士，原籍景县青兰乡东堡定村人。生前系冀南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兼27团参谋长，在一次与日寇遭遇战中指挥作战英勇牺牲，牺牲地在武邑县任角村。傅宪荣是景县人，长期在本县工作，后又在武邑县任过公安局长，既对故乡景县张俊峰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怀

有浓厚的崇敬之心，有着强烈的写作愿望，又有在景县和武邑两县境内非常熟悉的采访人脉和十分有利的写作条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经过一番东奔西走、南上北下的调查采访和伏案勤奋认真的写作，《抗战英烈张俊峰》一书由中国社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使张俊峰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的光辉事迹，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激励后人传承英雄精神，为建设美丽家乡多作贡献，意义重大而又深远。

《我的伯父傅训庭》一书记述的是傅宪荣的伯父——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党员领导干部的生前身后事，尤其可贵的是，傅训庭老人一辈子对党忠诚、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曾给家里立下“三不准”的规矩：“不准到家里来谈工作，不准收受任何礼物，不准利用职务的影响走后门、办私事”。傅宪荣的伯母王彩琴也是1949年参军入伍的老革命，从事部队医务工作多年，曾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医生”。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傅训庭的子女们个个成才成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特别是其儿子傅卫，不满15岁即参军入伍，在原63集团军188师564团团长江岗位上，率先垂范，尽职尽责，带领部队出色完成训练、演习、施工等各项任务，个人荣立一等功，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终年41岁。这个家庭演绎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壮一幕。傅卫的英雄事迹经各大媒体宣传，在军内外广泛传颂，被誉为“军中焦裕禄”，时任军委

副主席张万年上将亲切接见傅卫亲属，对英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傅宪荣把这样一个老革命、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好家庭的故事写出来，感人至深，生动具体，对时下的党风、家风教育启示多多。

《最后一杯咖啡》一书，是傅宪荣这位有着14年县级公安局局长经历的“老公安”在工作岗位上所见所闻的集合体。写的是近些年来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些典型案例，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普法教育的鲜活教材。他在书的前言写道：“那些难以忘怀的风风火火的日子，那些舍己为公日夜奋战的民警兄弟，那些惨不忍睹七零八落的发案现场，那些痛心疾首呼天喊地的受害人家属，那些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罪犯，桩桩件件，历历在目，使我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巨大震撼。我一直想把这些案件汇集起来写成一本书，让家人和朋友读一读、看一看，或有所感悟，或引以为戒，走好人生之路。”读了此书，感到作者的这一初衷已经实现。

《创业之路》是傅宪荣编著出版的第四部书，这是一部聚焦故乡景县十几位创业者奋斗历程的书。全方位、立体性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用衡水市景县籍作家牟俊忠的话说，这部书无论是涉猎的广度，还是写作的水平，较之他的前三部书，都可谓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既是故乡改革开放发展进程的缩影和记录，也是激

励人们在追梦路上奋勇前行的号角和动力。

《常庄史略》一书写的是傅宪荣原籍小村的历史。时空跨越600多年，写了古老村庄的历史变迁，记录下这里发生的人和事，讴歌了先辈传统美德和可贵精神，以及近现代社会村民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对于传承优良传统，建设美丽乡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当下不可多得村史资料书籍。

作家浩然在谈到几十年的创作经历时说过，生活实践是创作的沃土，离开农村农民，我的创作就会枯竭。傅宪荣之所以在退休后文思泉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也得益于其丰富的工作实践。由于他爱读书学习，善观察思考，勤动笔实践，很好地把握了自己拥有的多个创作素材，对笔下的人物事件都非常熟悉、胸有成竹，写作就变成了水到渠成、得心应手的事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傅宪荣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文学艺术孜孜以求的满腔热情和刻苦精神。离开工作岗位以后，他壮心不已，惜时如金，退而不休，有一种“老牛亦解韶光贵，不等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在文学写作上收到了大器晚成的效果。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写作到老的奋斗精神感人至深，值得学习和借鉴。



自古以来，中国人起名很讲究，而命名的出发点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商代社会迷信盛行，社会生活十分单纯，人们都以生日命名，最突出的就是30个商王几乎全以天干为名。

周朝建立，礼制规范，如何命名也有了诸多规定。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以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为“信”，以道德品行命名为“义”，以某一物的形象命名为“象”，借用某一物体的名称为“假”，取婴儿与其父相同之处命名为“类”。这些规定在古人命名时都有体现，如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赠送一条鲤鱼，孔子即为儿子命名为孔鲤、字伯鱼。此外，还规定不以国名、官名、山川、隐疾、牲畜、器帛等六种事物命名。

周朝以后，社会礼制急剧变化，其命名更多反映了社会下层的风貌，以贱、丑命名。如晋惠公的儿子叫“圉”，女儿叫“妾”；鲁文公的儿子则名“恶”等等。这时的人们还喜欢在姓和名之间加一助词，如烛之武、介之推、申不害、吕不韦等，其中的“之”“不”都是助词。

汉代国力强盛，人们祈求长生不老，取名也多用“安国”“延年”“延寿”千秋”“去病”等。西汉末年复古，王莽禁取复名，人们多取单名。直到东汉、三国，单名依旧盛行，因此一部《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

魏晋南北朝，因单名重复太多，复名又兴盛起来。由于受士大夫们清高风气的影响，人们取名喜欢用“之”字，如祖冲之、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裴松之、杨街之、刘牢之、颜延之、寇谦之等等。其又因佛教盛行，命名又多取佛语，如王僧辩、王僧智、柳僧景、柳僧习、崔僧护、崔僧佑等。

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取名多用“建国”“援朝”“跃进”等。

《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出版

本报讯（马吉兆）近日，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勇编撰的《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通过对民国之前京津冀旧方志中金石文献之辑录、考订和深入研究，分门别类挖掘阐发了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价值，并为方志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该书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综合考虑文献存世数量和价值、特征等情况，划分北

京、津唐廊沧、石家庄、保定及雄安、邢台邯郸、衡水、张承秦七大数据，对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展开专题研究。该书第六章专论衡水方志金石，分为“衡水方志金石文献概述”“衡水方志金石文献的文学成就”“衡水方志金石文献的文化精神”三节，对衡水的历史文化地理和明清以来旧方志的存世情况，以及不同方志版本中收录金石碑刻的差异做了介绍和考证，并对衡水方志金石文献中文学性较强的上乘之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解读。

岁月悠悠许家村

许万永

许家村，坐落于冀中平原武邑县韩庄镇，是于明朝1370年—1417年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而来。

当时，为了巩固新的政权，发展经济，朱元璋根据国家现实状况做出了一个大的决策——移民屯田。由此，我们的祖先告别故土，跨过太行山，一路东行，来到冀中平原一带屯田立村。这便是许家村的由来。

许家村呈卧龙盘抱之势，村西大坑为龙头，坑两岸大柳树为龙须，左右两眼水井为龙眼。村西大坑和沟河连通蜿蜒盘托绕村后东去直通老盐河，气势宏大，设计精妙。坑沟河这样设计，早能蓄水浇地，涝能排水保禾，确保村人衣食无忧。

上世纪70年代，村西坑两岸的大柳树高大繁茂，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的身姿，被它雄伟的气势所感染。许家村许恩普老老师在课堂上时常教育我们好好学习，走出许家村，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绝不能忘记许家村的大柳树。因为那是父老的牵挂，是许家村的门面。

许家村还有环村的枣林。每到暮春，枣花的甜蜜充盈在整个村庄上空，吸一口气让人心醉。人们把收获的枣晾干，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充饥接短。

许家村建村几百年来，虽未有经天纬地之人才，但不缺乏仁人志士、社会精英。

新中国成立前，以许砚堂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深耕农民运动，为民族的解放而不懈奋斗。许砚堂于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工作，后调到中国核工业部在包头的工厂。在三线建设时，又调到四川的核工业厂，一生为中国核

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学子许丙臣，天津大学毕业，中国天津仪器仪表高级工程师，在国家工业化尖端仪器仪表行业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许培森，思想超前，勇于探索。最早在韩庄镇一带走村串户，以独特的视角，用相机为人们记录美好的瞬间，以精湛的摄影技术得到人们的认可。

医者许恩泽，国家注册医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时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大善从医，誉满杏林，深受大众信任和尊重。

以许世珍、许恒巨、许成才为代表组成的许家村建筑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一直活跃在新中国各大城市建设中的地方。他们走南闯北，勇于开拓，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启迪着后人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精神。

许家村榨油坊、棉棉花房、馒头房等，林林总总的副业，在丰富着人们的经济收入，也充分展示了许家村人的勤劳、智慧、奋进的传统。

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许家村面貌大改善。从房舍、街道，到路灯、广场，处处充满着蓬勃向上的现代气息。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篮球、乒乓球、健身器械应有尽有，人们的生活态度积极乐观。许家村的年轻人有的进城务工，有的已在工作的城市置业安家。平日，村里来来往往的轿车比比皆是，新起的农居装修豪华，住房环境城市化，无不显示着人们生活的富足和幸福。年轻一代的许家村人，已经成了时代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定将许家村建设得更加辉煌耀眼、美丽富饶。

有限的付出。期待无限。雄厚的实力。价值永恒。

《衡水晚报》
微信息

订版热线

13503189058